

同济人文社科丛书（第五辑）
丛书主编 江波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潮与实践的哲学评析

左克红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

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潮与实践的哲学评析

左克红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持续达十年之久的“乡村建设”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奇观。追溯其源流,分梳其经验,对中国今天开展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历史参照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潮与实践的哲

学评析/左克红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 2

(同济大学出版社“乡村建设”丛书/江波主编,第 5 辑)

ISBN 978-7-5608-5745-9

I. ①2… II. ①左… III. ①城乡建设—社会思潮—

评析—中国—史料 IV. ①D693.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12273 号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潮与实践的哲学 评析

左克红 著

责任编辑 张 翠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张 微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41000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5745-9	
定 价	24.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概述	(1)
第一节 “乡村建设”研究的依据	(1)
第二节 “乡村建设”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4)
第三节 “乡村建设”研究的不足和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	(13)
第四节 本书的结构安排	(14)
第一章 “乡村建设”思潮的社会文化背景	(17)
第一节 “乡村建设”思潮的社会背景	(17)
第二节 “乡村建设”思潮的文化背景	(27)
第二章 “乡村建设”思潮的基本主张与试验	(34)
第一节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定县试验	(34)
第二节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42)
第三章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乡村建设”的批评和论战	(68)
第一节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所作的 批评	(68)
第二节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乡村建设”问题所展开的 论战	(77)
第四章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乡村建设”思潮的评析	(94)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问题的基本看法	(94)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理念与实验活动的总结	(118)
第三节 “乡村建设”派开创的参与式发展方法的现实 意义	(122)

第五章 “乡村建设”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转化	(135)
第一节 新农村建设兴起的社会历史渊源和当代条件	(136)
第二节 新农村建设的未来发展及其需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	(141)
第三节 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措施	(151)
主要参考文献	(156)

概述

第一节 “乡村建设”研究的依据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持续达十年之久的“乡村建设”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奇观。追溯其源流,分梳其经验,对中国今天开展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历史参照价值。

中国现代史上的“乡村建设”是在一个既非常特殊,又非常具有一般性意义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其特殊性表现为:中国的“乡村建设”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中国农民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政治上基本人权缺乏保障,经济上基本的生存条件也不能得到满足;他们所承受的剥削和压迫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农民所罕有的。其一般性意义表现为:世界各国在实现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有过农民受到相对剥削的一般共性,面对农民群体所遭受的不公正处境,一些具有人道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给予了批判和援助,从而为针对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出路探讨开辟了先河;这不仅为中国的“乡村建设”者提供了精神资源,也为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赋予了一般性的意义,也就是说,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世界各国都绕不开的一项现代化议程。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1913-2005)认为,前工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推进的三条主要历史路线分别是:第一,资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一条资本主义与议会民主携手并进的,是经过清教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等一系列革命问世的;第二条道路同样是资本主义的,作者曾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的反动形式”,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当薄弱,在经历短暂和脆弱的民主时期后,便成了法西斯主义;第三条道路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其中革命的发

动者以农民为主。

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queville, 1805-1859)在分析法国大革命和农民状况时曾指出:在法国社会经历的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农民的利益被极度忽视与损害,农民阶层成为被现代化所遗忘的群体。他不无惊讶地责问道:“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 18 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 13 世纪还糟?”^①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状况分析,他发现,对农民的过度盘剥是导致农民处境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虽然在当时,封建制度压在农民身上的种种沉重负担无疑已经撤销或减轻了,但是,取而代之的也许较之前更为沉重。农民承受着其先辈闻所未闻的税赋压力,那就是繁重的军役税,不加约束、横征暴敛的征收方式,以及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道路交通的需求导致的劳役的增加。对农民的过分掠夺导致了一种剥削有理的意识形态在法国风行一时,譬如:维持农民的贫苦是保持他们勤劳美德的必要条件,农民的贫穷与痛苦被富人解释为“人民的美德、温顺、忠诚与快乐无邪”;农民则千方百计地设法逃离农村生活而向往与模仿城市生活。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前夜的法国社会背景。对农民利益的极度漠视不能不说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个诱因,尽管一部分有着先见之明的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重农主义的经济主张,但已经无力阻止那孕育已久的火山喷发。

俄罗斯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以资本主义的牟利动机来掠夺农民利益的情形,难怪摩尔要毫不犹豫地宣布现代化是对农民的一场掠夺运动了^②。19 世纪俄国的资本主义土地改革朝着有利于资本家和地主的方向发展,结果,最终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才能解决农民和地主资本家之间的矛盾。19 世纪俄国的社会现实造就了一大批力图改变不合理现实的知识分子,他们号召人们到民间去,从而掀起了一场民粹主义思潮,它成为“十月革命”的前奏。

在研究现代化的各种学术论著中,城市中的工人阶级和资产者之间的矛盾,构成现代化进程中的最重要景观,农民基本上属于无声无息消亡

①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

② [美]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

的阶层,似乎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发挥什么作用。然而,摩尔却发现:“在历史转折点上,传统农民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位置,农民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主体,在两大文明接替更换之际,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结构,会成为型塑未来社会发展路径的重要因子。”^①法国和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表明农民是现代化进程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现代革命史也再度验证了这一假说,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农业国要实现现代化,农民与农村是无法绕开的主题之一。

马克思早就指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②因为只有农业生产发展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农业生产的物质产品除了满足劳动者自身的需要,还能养活一部分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的时候,社会的分工与进步才有了生活必需品的保障。列宁在论证农业基础性地位的时候说:“真正的经济基础就是粮食储备。”^③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早已为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可。邓小平指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④“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⑤江泽民说:“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就不可能有我们国家的自立;没有农业的积累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我国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业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⑥由此可见:没有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真正的、全面的现代化。因此,研究中国现代史上这一颇具代表意义的“乡村建设”运动,对我们探索完整意义的现代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对农业和农民的关注是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西方世界包括苏联和日本在其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曾出现过重农主义的思潮和运

① [美]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

③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

⑥ 《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动,法国的重农主义、俄罗斯的民粹主义、日本的新村运动都表明一个国家和社会在其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必须处理好农业、农村、农民与传统的关系。中国“乡村建设”的提倡者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西方世界的这些思潮自然有所借鉴和参考。马克思·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在提倡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的同时,又对这种科学主义所造成的人文精神的沦丧表示了担忧。以科学主义方式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解决文化和道德的缺失问题,在实现现代化和维护传统的美德之间似乎存在一个相互抵触的悖谬,但是,这两者都是一个国家实现其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的缺一不可的标志。梁漱溟认为他所倡导的“乡村建设”就是试图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克服西方社会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副作用的灵丹妙药。但是梁漱溟的美好愿望并没有被很多人理解和接受,更没有在中国真正得以实行。处在 21 世纪的中国,我们一方面努力追寻着现代化的强国梦想,另一方面也承受着现代性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诸如发展机会的不均等、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道德、文化的沦丧和生态的恶化等。而这一切似乎都能从历史上的争论中得到启发与感悟。我们今天强调将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结合起来,就是要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兼顾效率与公平,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而在这个实现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农民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状态,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因此,研究历史上的“乡村建设”,对当代的新农村建设和实现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乡村建设”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中国的“乡村建设”是在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共同作用下孕育发生的。自“乡村建设”的主张提出开始,围绕它所展开的争论就一直时断时续地进行着,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也可以说自其发生到现在也一直处在起伏迭宕之中。历来的“乡村建设”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阶段,这就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50 年代和 90 年代至今。“乡村建设”的第一个研究期,具有两方面的特征,即提倡者和批评者两种研究视角,由此得出的主张和建议也是截然不同的;50 年代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主要以批判为主,呈现一边倒的态势,批评与指责取代了科学探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对“乡村建设”研究的重新兴起,并站在一个反思和借鉴的立场上,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①。

目前,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展开,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学术界更加注重对历史上的“乡村建设”经验的总结,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发掘和重审“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此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宋恩荣等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詹一之等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价》、屠茂芹的《梁漱溟在山东做的实验》以及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对“乡村建设”的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实验等作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和评论。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吴湘湘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史笔,勾画了晏阳初 60 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吴洪成的《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一文也再现了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实验的史实,并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及理论反思。此外,陈晓华的《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王安平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等文章分别对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而郑大

^① 本书对“乡村建设”的分段以及对学术界相关代表性观点的论述参考了何建华、于建嵘的《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 年 7 月)一文的主要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研究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两种“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并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内容和成败得失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李得全的《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则以福建“乡村建设”的史实为基础，探讨了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农村经济衰落的基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成效的评价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方式，他们对“乡村建设”褒贬不一，大致可区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肯定多于否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看法为：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一种选择与探索；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存在诸多缺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甚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国民党政府的作用，延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但“乡村建设”实验的许多经验可以为我们采用，有些甚至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借鉴、启迪作用；因此，对“乡村建设”运动重新进行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如熊吕茂认为，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新考察和审视这一由知识分子自觉发动的民族自救运动，除了指出其缺点和错误之外，还应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评价它的积极作用。^① 鄢烈山认为，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至今仍有显著的启迪价值：“一是要真诚地信赖平民，致力于开发民智与民力的基本建设。”“二是退一步讲，从政治技术层面，只有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三是精英阶层与强势集团要有远见，舍得抛弃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存共荣。”“今日审视晏阳初的实践，相信可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②

①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鄢烈山：《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载《南方周末》2003 年 7 月 24 日。

第二种,宏观否定,微观肯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在宏观上对“乡村建设”理论体系及实践活动基本否定,但在微观上,对“乡村建设”运动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给予肯定。如郭蒸晨在其《对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所说:“‘乡村建设’运动不但不能根本救国反而会阻碍和延缓革命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说‘乡村建设’的路是一条在中国走不通的路,一条失败的路,一条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路,但从微观上,从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上,仍不失其进步的积极的意义。”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具体的思想和主张,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继承。”^①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张卫军、张国强、钟飞辰等。^②

第三种,“不以成败论”。就成效而言,有少数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是失败的,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③在温铁军的观点中应该还包含这样的潜台词:“乡村建设”没有顺利延续和展开并不表示其失败和无价值,只要农村问题还存在,就还是要进行“‘新’乡村建设”,只不过其方式和途径与过去有所不同罢了。

二、对“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

学术界根据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从庞杂的“乡村建设”运动队伍中概

① 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张国强、钟飞辰:《试论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③ 温铁军、熊景明、黄平、于建嵘:《中国大陆“乡村建设”运动》,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括出了许多派别模式,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同时对它们形成的文化理论背景、目标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他们认为,“村治派”是“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改“头”,是指“村治派”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对“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注目。而在这众多的模式中有明确的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平民教育派”的定县模式和梁漱溟“乡建派”的邹平模式。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又提出了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的北碚模式。

学术界认为,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宪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宪政问题的不懈探索者、实践者。然而,从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等原因,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是“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救国运动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①。对于梁漱溟思想的这一转变过程,李德芳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一文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②。熊吕茂等进一步指出:“梁漱溟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的体认与自信。”^③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④其目的是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

① 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李德芳:《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1 年第 8 期。

③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④ 陈宪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载《华侨大学学报》1999 年第 2 期。

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是他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设计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苏俄共产党的“儒家社会主义”之路。^①熊吕茂认为,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郭燕晨更明确地指出,梁漱溟“理想的通过‘乡村建设’成的未来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

影响晏阳初一生的中国儒家“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其平民教育实验的出发点,基督教的博爱、平等思想以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是其平民教育实验的精神动力,而实用教育理论是其平民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对农村问题思想认识上的深化是其平民教育实验的思想根源。“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之下,建立起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蓝图”^②。如果把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出发点上虽然有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点,然而在从事“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其现代民本政治观,他继承了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在内涵和精神方面赋予其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作为他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核心。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的核心目标是救治“愚、贫、弱、私”,因此,他开展了对应的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并采取了以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方式连环推行的基本措施。他的“平教运动”的宗旨则是“除文盲,做新民”^③。晏阳初理解的文化与梁漱溟不同,他比较重视“科学的”、“平民的”文化知识,而梁漱溟更倾向于用儒家的精神来教化农民,从而拯救中国农民因文化匮乏而产生的危机。梁漱溟自认为他比晏阳初、陶行知等更具有彻底的哲学反省性。

近年来,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模式得到某些学者的关注。有学者指

① 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② 吴洪成:《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载乡村教育网2005年3月2日。

③ 张卫军:《评晏阳初平教会“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载《济宁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出,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对中国农村问题总的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所概括的:中国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而真正与梁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并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和具有特殊价值的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溟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的代表人物。^①

三、对“乡村建设”运动性质的评价

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的,但它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在政治倾向上,乡建派是处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②。宋恩荣在论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影响时也说,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实质上是一批怀着赤子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企图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洪流,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可贵尝试”。^③王安平在论及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时 also 认为,“他的‘乡村建设’主张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

① 郭剑鸣:《试论卢作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兼谈民国两类乡建模式的比较》,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② 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③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1卷“序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和理想主义色彩”。^①

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性质的评价争论较大。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是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现代化”,既保存先贤的“无价之宝”和“真实人性的发现”,又足以使人民“获致富强”,还可以免得在道德上照搬西方的社会悲剧。然而,他的理论和实践充满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梁漱溟终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② 马东玉认为,梁漱溟“追求的文化实质上是‘唯一真正人的文化’,所以说他是改良主义者,也仅仅是从他当时所搞的‘乡村建设’,比照‘革命’的道路,就中国的暂时框架而言的”。“他的思想跨越了时代,但实际上又无法跨越时代,他总要从中国的实际入手去一步一步地做,他在起步行动时没有真实地把握中国的阶级矛盾的现实,毕竟是依靠了中国的现有国家和政府,从而堕入‘文化至上’、‘行动改良’的窠臼之中。更加可悲的是,既依靠了军阀,便把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阶级斗争的道路,把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尤其把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农民进行暴力革命,视为‘社会动乱’、‘杀人放火’”,“使他的立场最终站到了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对立面”^③。

郑大华在分析乡建团体的复杂性和乡建模式的多样性后提出,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当然各实验区的侧重点不完全相同),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④。

① 王安平:《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 罗义俊:《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 艾思奇:《胡适梁漱溟哲学思想批判》,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④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四、“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随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把研究视角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转移到与其相关的其他方面,与“乡村建设”运动密切相关的 20 世纪 3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推行的县政建设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变迁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认为,晏阳初在定县实施的以一个县为实验研究单位的乡村教育模式,不仅对中国当时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验有很多启发和影响,而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岌岌可危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加强对乡村的控制,国民党政府开始关注当时已渐成气候、影响日益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 1924 年到 1932 年期间,所作的努力是自下而上的独立的、学术性的研究工作,没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他逐渐醒悟到,当初没有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是自己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足,并因此开始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把目光转向“平民教育运动范围以外”的政治改革问题。1932 年,他开始尝试自上而下的县政改革,并积极谋求与国民政府合作。于是,国民政府采用了定县的成果,于 1932 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因此,“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所提倡的“政教合一”的原则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即县政建设运动阶段。对于县政建设运动,郑大华、李汝东、李志惠、马东玉等在有关专著中都有所论述。

近年来,有关“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基层社会影响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于建嵘通过对湖南省衡山县的“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下述结论:自“乡村建设”运动之后,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乡镇实现了行政官僚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传统绅权出现了与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的趋势;宗族组织